

从崇仰到扬弃: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的认知历程

○ 杨宏雨, 吕 啸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邹韬奋是伟大的“爱国志士、民主先锋”,其民主思想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宝库不可或缺的一页。如何正确看待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是邹韬奋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他先后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扬弃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可圈可点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他探索、思考的印迹,也是他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足迹。

〔关键词〕邹韬奋;一般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扬弃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5.017

1944年7月,在中国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际,伟大的“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朱德语)邹韬奋因病去世。1949年7月,周恩来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邹韬奋曾非常羡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1929年这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给了他当头一棒,使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与此同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态度也从欣赏转向批判。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邹韬奋因时而变,提出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苏联一党专政,又有别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新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新式的民主政治应是符合中国抗战需要的多党团结合作的“真正全民民主政治”^{〔1〕}。在这一阶段,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认知超越了前两个阶段,带有很明显的理性和辩证色彩。

作者简介:杨宏雨(1965—),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吕啸(1986—),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一、欣羨(1919—1931):“不得不叹美国之不愧称为民主国”

191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是学界公认的“现代中国的新起点”。^[2]1919年也是邹韬奋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他从南洋公学电机科转入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主修西洋文学,不用再“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3]。圣约翰的社会科学教育虽然只是“沿袭着美国式的传统的说法,就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去,似乎给予学者的没有什么精要的知识,但是近代新社会科学也不是凭空突如其来,要彻底懂得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真谛,对于传统学说也需要有相当的明瞭”^[4]。因此,圣约翰的教育对邹韬奋民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1919年也是中国新教育运动突飞猛进的一年。在这一年,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宣传其“生活即教育”“从做中学”和“儿童中心”等教育思想,所到之处,备受欢迎。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齐头并进的历史背景下,邹韬奋大量阅读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并开始翻译杜威的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和罗素的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思潮的浸润下,在杜威和罗素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思想的影响下,1919年前后,邹韬奋从一个民本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5]。

1940年5月,邹韬奋曾发表过《今日之五四运动纪念》一文,指出五四运动中“德谟克拉西的呼声,震动了全国”,但当时运动的领导者所提出的“只是资本主义民主”^[6]。诚然,五四时期虽有少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尝试用社会主义救中国,但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还是英美的。此时的邹韬奋也是崇拜欧美民主政治模式,并热切希望中国能走西方现代化之路的群体中的一员。

五四时期邹韬奋已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在1927年以前,他谈论民主政治的文章较少。这一则因为他关注的重心在教育,二则是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的影响。^[7]1927年,在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影响下,邹韬奋开始讲政治、谈民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先后发表了《民权的意义与由来》《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什么是真平等?》《欧美人争得了多少民权》等多篇作品,阐述自己对“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民权主义之研究”^[8]。1928—1930年,邹韬奋先后发表了《美国哈定总统的身后》《平民总统的平民交际忙》等20多篇相关文章,介绍和评论欧美的民主政治。在这些文章中,邹韬奋向读者传达了以下政治理念:

(1)和平竞争。在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的轮替、领导人的更迭靠大众的选票,“并不靠有个人的武力做后盾”^[9]。对这种和平民选,邹韬奋由衷地赞叹道:“想做‘元首’的人不恃‘兵’为后盾,而恃‘民意’为后盾,我们可以套一句文言文的常调儿,叫做‘国政其庶有豸乎’。”^[10]

(2)机会均等。在美国大选中,“无论那一位,只要他的能力德望及事功够得

上全国人民的爱戴的”^[11]，都可以入主白宫。“美国历任总统出身寒微者十居六七”^[12]。除了中国人熟悉的林肯外，“胡佛由贩报童子出身而选入白宫”^[13]，“威尔逊虽是一位‘教书先生’，也住过一次（白宫）”^[14]。邹韬奋称赞美国这种公职面前无分贵贱、机会均等的做法是“民治国平民精神的一种体现”^[15]。

(3)品德高尚。欧美民主国家的竞选，是对公权力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这个政治游戏能不能玩得好，除了依靠各种防弊的规则以外，候选人的自律也很重要。在美国大选中，“胡佛力戒他的部下要‘严正的选举运动’，史密斯力戒他的部下不许有‘污浊的行为’”。邹韬奋热烈称颂两人这种“光明磊落”的竞争精神，赞扬他们是“美国国家的两个得宠儿子”，“无论哪一位获选，都是全国国民的幸福！”^[16]1928年11月，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消息一经证实，史密斯“即以电贺”。邹韬奋评论道：“史密斯竞争选举总统时虽出其全力竞争，等到竞争失败，竟能这样光明磊落的毫无芥蒂，竭诚致贺对方的优胜者，这真是民治国国民的真精神！”^[17]

(4)爱民亲民。英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是带着对人民的承诺参选的，因此执政以后，必须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英国工党内阁一经产生，立即全力以赴谋求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把人民的失业，引为执政者莫大的责任”^[18]。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敢玩忽职守、懒政怠政呢？邹韬奋解释说：“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不能为国民生计及国家建设努力的政府，国民便要请它下台，上海话所谓‘呒客气’。”^[19]

英法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既由人民选举，上台与否由人民说了算，所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往往为博取人民的拥护而展现出亲民的形象。这在美国尤为突出。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既没有什么围墙，也没有什么兵士”。游客可以在白宫的草地上“跑来跑去，简直自由的很”。游客还可以到白宫“和总统握一握手”。柯立芝总统在任时，“每天和他握手之人，常有五百人之多”^[20]。

(5)廉洁自律。英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薪俸很有限。“法总统年俸二百五十万法郎，合目前市价，约合金洋十万元。美总统年俸金洋七万五千元，加上二万五千元旅行费，亦为十万元。两国总统遇有他国上宾如国王之类到本国来，招待费都须自己掏腰包，所以仅够开销”^[21]。在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没有当时中国常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约翰柯立芝“虽是总统的儿子，在美国实与一个平民无异”^[22]。胡佛的儿子“小胡佛”在美国“西方飞船转运公司”（Western Air Express）供职，“和其他职员一样的要严守公司的一切规则。”^[23]在英法美这些国家，人人都要“从下层工作做起以求上进，不凭藉任何奥援或势力。”^[24]拼爹是不好用的，也是不管用的。

(6)司法独立。在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司法是独立的，“法官为终身职，不受政潮的影响”。“英国的内阁虽随政党为进退，但由内阁所任命的法官却是终身职”；“美国的总统是有党籍的，但是美国联邦的法官由总统得到上议院同意任命后，除了弹劾之外，也是不能免职的。”司法独立不仅可以“培养法官正直无私

不偏不倚的胆量”，而且能“增加人民尊重法律的观念。”^[25]

(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美国，这句话不适用。美国的煤油巨商辛克勒尔因蔑视法庭被判监禁九十天。辛氏虽在美国商界位高权重，但“一受法律之制裁，即须全照常人一样关入狱里，饱尝铁窗风味”。在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法律“不认得贫富，不认得阶级，是一律平等的”^[26]。

(8)女权发达。在英法美这些国家，经过各界人士的多年努力，女子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1928年5月的英国总选举中，妇女的选票“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党都不得不求她们的帮忙。”^[27]英国一向“以守旧闻于世”，但它不仅下议院中“有十个女议员”^[28]，而且“榜翡尔女士”还被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任命为“劳工部部长”^[29]。“女权的膨胀，一天高一天”^[30]，这是欧美社会的大趋势。

此外，在英法美这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到期离任，不得恋栈。不仅如此，“美国做过总统卸任之后，都另就一种职业以自给”^[31]。总统来自人民，在任职期间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效力，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但期满离职后即与普通人无异，不能另有特权。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919—1930年，邹韬奋对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就是好民主、真民主，是民主带来了英法美的繁荣、稳定、进步。此时的邹韬奋在民主问题上还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只有一般的民主概念。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邹韬奋特别欣赏美国。1928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此时美国社会稳定、经济蒸蒸日上，工业产值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值的48.5%，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宣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连篇累牍地报道美国的这次大选。在为介绍美国大选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邹韬奋多次表露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是一个理想世界，“不愧称为民主国”^[3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邹韬奋并不十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其对西方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国外报刊、《生活》杂志的海外通讯员以及一些亲朋好友的见闻。

二、否定(1931—1937)：“美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府是华尔街资本专政的假面具”

1929年，就在胡佛就任美国第31任总统，向国民许诺“每家锅里有一只嫩鸡，车房中有两辆车”，吹嘘“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悄然而至。危机期间，欧美各国大批企业破产，工业生产下降37.2%，退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人数激增，失业率高达30%以上，呈现出“经济恐慌、百业萧条”^[33]的凄凉景象。这给立于“平民地位”，致力于“民族兴盛与社会改进”^[34]的邹韬奋以极大的刺激，1931年7—8月，邹韬奋在《今后全国应集注的三大工作》一文中说：“旷观世界大势，看清无限制的私人资本主义之终必走上绝路”^[35]。之后他多次表露出对

资本主义前途的失望。“世界大势所趋，私人资本主义终必灭亡，社会主义终必胜利，在有识者已认为无疑的倾向。”^[36]“资本主义进展到了第三期……是朝着‘油干灯草尽’的路线走去，这是很显然的趨勢”^[37]。

根据笔者的研究，1928年8月邹韬奋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在《生活》周刊第3卷38期发表了《不平等条约到底说些什么？》，在文中首次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38]，但在1930年3月以前，他对这个概念仅偶一用之^[39]。1930年8月，在邹韬奋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40]，同年10月，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名词^[41]。1930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在邹韬奋的文章中先后亮相，并连同之前就出现的“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一起被多次使用，这表明，邹韬奋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阶级论。联系他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出，1930—1932年是邹韬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由肯定到否定的转变期。

1931年初，胡愈之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对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访问，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介绍了其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在该书的序言中，胡愈之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产生了许多奇迹”，比如“苏联产业改造的超过亚美利加的速率”，但最大的奇迹却是“人性的发现”。他说苏联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他断言，这是“因为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42]胡愈之的文章给坚持平民立场、关注大众生活的邹韬奋以很大的启迪，仿佛在迷茫黯淡的探索之路上突然看到了一盏明灯。他马上写了《读〈莫斯科印象记〉》一文，向读者推荐胡愈之的著述。不久，邹韬奋又阅读了曹谷冰的《苏联视察记》，更确信苏联社会主义前景的光明与美好。1931年10月，邹韬奋在毕云程的陪同下专程拜访了胡愈之，约胡为《生活》周刊撰稿。

与胡愈之相识以后，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2年7月，他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发表《我们最近的趋向》，指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源，都可归结于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取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而绝非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和西洋的虚伪民主政治的老把戏所能挽救。……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43]这是邹韬奋第一次公开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标志着他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进入了否定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邹韬奋立即在《生活》周刊上呼吁“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对外”^[44]。他严厉斥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指出“‘不抵抗主义’就是‘极端无耻主义’”。^[45]他批评国民政府不积极备战而寄希望于国联主持正义的做法，指出：“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早为彰明较著的事实”。^[46]《生活》周刊“对于民族解放的倡导及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攻

击尤不遗余力”^[47]，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因而其发行量大增，达 15 万份以上，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惕。蒋介石先是让胡宗南约邹韬奋谈话，要他改变办刊立场，遭到拒绝后，又以“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48]为由，禁止邮递该杂志。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邹韬奋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出国考察，“藉此暂离，以和缓对方对《生活》之紧张。”^[49]从 1933 年 7 月 14 日到 1935 年 8 月 27 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邹韬奋先后考察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国家，获得了认知世界各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中，对英法美等国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法国，邹韬奋目睹了法国人的浪漫、社会组织的严密以及“利用科学于交通上的效率”^[50]，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衣服褴褛蓬发垢面的老年瞎子”，“一面叫卖一面叹气的卖报老太婆”，以及“无数花枝招展挤眉弄眼向人勾搭的‘野鸡’”等“很凄惨的现象”^[51]。

法兰西的民主在欧洲占“第二把交椅”^[52]，但法国的所谓民主除了以闹“阁潮”闻名于世以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作者到欧洲考察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法国“已有了三十一次的内阁”^[53]。邹韬奋还亲眼目睹了法国众议院讨论议案的“热闹”场景——“本党人发言，本党的议员大鼓其掌，反对党的议员便同时你一句我一句插着大声瞎闹，此时最难做的是议长，拿着一个戒尺在桌旁打着，不行，就大摇桌上的钟，有时可因此略停数分钟吵闹，不久又闹做一团”^[54]。

在英国，邹韬奋发现“伦敦一般居民的住宅，除贫民窟的区域外，都设备得很清洁讲究，在马路上就望得见华美的窗帷。”^[55]但就在这华美的窗帷的后面，却有着“天天在孤独劳苦中挣扎地生活着”^[56]的老人，有着“因受经济压迫而不得不以‘皮肉’做‘生产工具’”^[57]的良家妇女。

英国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在伦敦，西伦敦（West End）与东伦敦（East End）完全是两个世界，前者是富人的世界，繁华阔绰、光彩耀人；后者是大规模的贫民窟，阴暗破旧、肮脏不堪。“电车一开进了这个区域，就看见在西伦敦所没有的旧式烧煤的汽车在街上跑来跑去……电车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穿着破旧的不整齐的衣服”，“贫民窟里的住宅，大都是建筑于百年前的老屋……一所屋里住着几十家，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堆满着许多人”，“英国是科学发达的国家，电灯应该是很普遍的了，但在这一带贫人住宅里，还是用着油灯或点着蜡烛”^[58]。在英国“贫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两倍，婴孩死亡率更厉害。”^[59]

在伦敦，邹韬奋见识了“英国式的‘君子人’（‘Gentleman’）的音容态度”，还感知到了西方人排队、守秩序的好习惯，这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同时，另一些景象——伦敦街头五花八门的叫化子又让他心酸，感慨万千。在伦敦，最常见的叫化子是东一个西一个捧着小纸盒的卖自来火的人，其他的还有在

马路边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吹喇叭的、打洋琴的、翻筋头的、拿着书高声诵读的，甚至还有穿着学位服“大声演讲”的，这些都是变相的乞丐^[60]。这些人之所以用各种方式掩饰着自己的乞讨行为，就是因为放不下面子，“舍不得独立观念”^[61]。对于这些人，邹韬奋意味深长地评价道：“有独立观念的叫化子，其现象比单纯的叫化子，当然更含有严重的意义。”^[62]

英国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在政治上向有‘巴立门的母亲’的尊称”。邹韬奋在英国下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滔滔辩论”。他观察到，与法国的哄闹不同，英国众议院是“所谓‘绅士式的战争’”^[63]——“英国的众议院开会的时候，秩序比较好，一人说话未完时，别人很少起来插嘴，讲到得意时，本党的人也不过附和急叫‘hear! hear!’罢了”^[64]。

邹韬奋发现，这种“绅士式的战争”虽然秩序比较好，但从根本上看，也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英国的执政党与反对党，“虽似乎处于敌对地位，但根本上都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两大队‘绅士们’，无论他们在会场上的‘绅士式的战争’干得怎样有声有色，要想他们能从这‘战争’中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弄出什么根本的改革来，那是绝对无望的。”^[65]

在政治舆论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说，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其对社会又有何意义？在考察英法的时候，邹韬奋发现：“法国的报纸，无论极左的报或极右的报，对于政府的批评指摘，都尽量地发挥……议员在议院里当面斥责政府要人，那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66]在英国，《每日传知》《新导报》《每日工人》等左翼报刊，明目张胆地攻击政府，嘲讽政要，但“从没有听见政府当局说他们有反动嫌疑，非搜查没收不可。”^[67]英法这些国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真实的。与专制的国家相比，英法民主政治的“最大的特点可以说人民的确已得到‘纸上自由’了”^[68]。

英法的言论自由虽然是真实的，但这种自由除了可以让受压迫者“呻吟呼冤”^[69]，发泄一下不满和怒火外，它的社会意义是很有限的。“号称‘巴立门的母亲’的英国，为欧洲‘民主政治’国家的老大哥，关于‘纸上自由’或‘嘴巴上的自由’，也可算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70]，但“在行动上，统治阶级的爪牙——警察侦探等……也就防范得厉害。”英国政府动用大批警察采用盯梢、跟踪、盘查等方法对付共产党员和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好像布满着天罗地网似的”^[71]。因此，要想依靠所谓舆论批评来达到变革或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只能是“纸上谈兵”^[72]。

美国是邹韬奋海外之行的最后一站。当时美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巨擘，“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国家”^[73]。在这里，他看到了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和“好像成群结队似的矗立着的摩天高屋(Skyscraper)”^[74]，感受到了美国的科学进步和“在利用机器方面特别发达”^[75]，同时也看到了：

(1)色情表演和私娼。在纽约百老汇，“可以看见成群的年青女子几乎是完全裸体，在台上作各种舞蹈，还有单独的女子最初穿着舞衣在台上依音乐步行，

逐渐把衣服脱去,脱得几乎一丝不挂。”这就是当地最著名的“大腿戏”。邹韬奋抨击说,这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里性的诱惑之尽量的被人作为剥削的一种工具”的表现。除了色情表演之外,纽约的私娼也很繁盛,“在百老汇路最热闹的一段的路旁里就有五十多处‘秘窟’”^[76]。

(2)贫富悬殊突出。在纽约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城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靠着剥削他人血汗”获得财富的富人,居住在宽敞豪华的洋房里,“内部设备的华丽,起居饮食的舒服”以及大客厅的“富丽堂皇”,再好的笔墨也“难于描述其万一”^[77];一类是“靠着出卖劳动力来勉强过活”^[78]的穷人,往往是几十个人家拥挤在“一所破旧的公寓里”,室内“桌椅不齐,拥挤不堪”。^[79]“一是天堂,一是地狱”^[80],就这样在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纽约共存着。

(3)种族歧视。19世纪60年代,经过南北内战,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从那时起,到20世纪30年代,历史已过去了一个甲子以上,美国的黑人的状况如何呢?在考察中,邹韬奋发现,美国“仍然有着变相的农奴”,“所谓解放黑奴,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句空话罢了。”^[81]譬如,在首都华盛顿,“除在黑区外,任何公共的地方,各旅馆菜馆戏院等等,都不许(黑人)进去。白种人做汽车夫的街车,也不肯载黑客。白人开的旅馆不但许黑人进去住,连黑人偶来访友,也不许乘电梯。”^[82]又譬如“依法律虽不许买卖人口,但是在美国的南方‘黑带’里,甲地主要向乙地主让若干变相的农奴,只要出多少钱给甲地主,以代这些变相的农奴还债为词,便可用塌车整批地运走”^[83]。在美国南方,白人不仅侮辱黑人为“尼格”(Nigger),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用最残酷的私刑弄死黑人”^[84]。

(4)“合理化”成了榨取工人血汗的帮凶。在考察中,邹韬奋经常听人谈起“Speed-up”(意译为“赶快”)这个词。但他注意到“这个名词,你和美国工人谈起,他们是最切齿痛恨的。”^[85]为什么呢?因为“赶快”这种“资本主义合理化”运动“是由雇主所聘用的专家依着所计划的方法,在机器上增加种种特制的机件,在工厂的布置上增加种种紧凑的安排,使工人的工作速度非常地增加”,“这在雇主方面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更多的财富。在工人方面呢,所得的结果是更艰苦更迅速的工作,更多的危险和更短的生命,更多的减工和更多的失业,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少的休息期间,工资的更甚的减少和生活程度的更甚的减低。”^[86]一句话,资本主义的“Speed-up”,只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是榨取工人血汗方式的进步。

在目睹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之后,邹韬奋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判断说:“美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府是华尔街资本专政的假面具”^[87]。华尔街的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凭藉着经济的无上威权,控制着共和和民主两个政党的机构,指挥着全国的政治策略”,“号称‘公仆’的德谟克拉西的大总统,以及无数的大小官吏,都不过是这些‘大亨’们的在后面牵着线的舞台上的傀儡罢了!”^[88]

“在政权操诸资产阶级的国家,虽有以民主政治为幌子的,其实各政党后面

都各有其资产阶级做后台老板，他们所能容许推举出来的‘贤人’，都不过是最能有益于他们少数人利益的人物，否则便没有登台希望”^[89]。这是邹韬奋在1932年底写下的一段话，两年多的出国考察，更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是假民主，是“欺骗民众”^[90]的鬼把戏。这就是邹韬奋这一阶段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

与前一阶段相比，邹韬奋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再就政治谈政治，而是把西方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他深入到英法美等国家的下层群众中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触目惊心的贫困和尖锐的贫富对立，看到了资本主义垂死和腐朽的一面，而这正是他批判资本主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依据。

除考察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以外，邹韬奋也游历了他心中神往已久的苏联。此时他已经“接受了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加上“时间的短暂、语言的障碍、交通的困难、东道主对旅游活动的精心安排以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苏联旅行社以及外交文化协会等机构的无形‘操纵’等”^[91]，苏联之行让他相信苏联的“无产阶级独裁”比欧美的“实际为资产阶级独裁而偏要自谓为全民利益”的资产阶级民主把戏更代表民众的利益。“苏联的领袖，党和勤劳大众，是联络成一片的，也可说是‘三位一体’。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代表勤劳大众的利益；领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领导全党为着勤劳大众的利益而奋斗。领袖领导党，党领导大众。就另一意义说，党受勤劳大众的意识、愿望所领导；领袖的功能也在能使党受勤劳大众的意识、愿望所领导。”^[92]“苏联的新社会不是乌托邦，是从现实中做出发点而英勇斗争出来的；是一万六千五百万的大众靠着自己的奋斗迈进，解除了压迫和剥削的锁链，铲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根据他们所信仰的根本原则，继续向着自由平等的人的生活大道走。”^[93]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苏联之行极大地增进了邹韬奋对无产阶级专政认同，进而更坚定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

20世纪30年代初，一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挣扎，另一方面，苏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社会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此时，苏联的大肃反还没有开始，其政治体制的弊端还没有暴露出来。两相对照，反差明显，这是邹韬奋此时全面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时代背景和重要依据。

三、扬弃(1937—1944)：“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正是民主精神的表现”

1935年10月，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从局部扩大到整体，国共两党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精神，迅速携起手来，共赴国难。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很快被国民政府从监狱中释放。出狱后的邹韬奋立即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先后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复刊)等多种杂志,向民众宣传民主抗战、团结抗战、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等进步思想,用一个报人最擅长的办刊活动和文字宣传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战事业贡献力量。抗战时期,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资产阶级民主有其进步性。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邹韬奋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性作了重新思考。一方面,他认为,与苏联“实际上已达到全国人民共享”^[94]的社会主义民主相比,“资本主义民主的限度却是很显然的”^[95]，“尤其是财产限制所加的束缚。”^[96]换言之,因为没有经济平等这一前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实际上还是由少数人操纵”^[97],并没有真正达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境地。“英美是多党的民主政治,但是他们的议会里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未必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98]另一方面,邹韬奋认为,不能因此就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性,把它看作是“与法西斯专政毫无二致的东西。他说:英美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专政的民主”,而德意日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反民主”^[99]。双方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英美民主政治领袖及其政府是由民意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其权力是由人民通过所选出的民意机关依宪法及法律程序而授与的,经常还须受民意机关的监督;法西斯国家的领袖及政府,却是由压迫人民欺骗人民,靠枪尖来支持,人民只有呻吟宛转于暴政之下而无可如何。”^[100]前者是民主阵线的一部分,后者是反民主阵线的。前者“至少还给人民以相当限度的民主权利”^[101],后者却是“民主政治的最顽固反动的障碍物”^[102]。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肃反运动,成千上万无辜的公民被流放和枪决。大肃反运动是苏联以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为核心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103]。可能由于30年代初的苏联之行留下的印象太美好,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苏联大肃反的相关信息,此时邹韬奋仍坚信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苏联的民主“不仅是限于政治的活动方面,而在实际上是渗透于全国人民各部分的生活里面去。”^[104]苏联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一党的民主政治”^[105]，“苏联一党政治的‘一’，是由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所要求,是为着全国最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自然存在的。”^[106]邹韬奋对苏联民主政治的崇拜和为苏联一党专政所做的辩护在今天看来确实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才获得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而此时邹韬奋已经去世12年了。

邹韬奋对苏联政治的认识虽然有失偏颇,但他通过对比英美民主政治和德意日法西斯专政来论证前者的进步性的做法无疑是睿智的。他引用英人斯隆的

观点说：“英国的民主当然较胜于法西斯国家的独裁”^[107]。民主是专制和独裁的对立物，英美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够理想，但仍有反专制、反独裁的进步性。抗战时期，邹韬奋既把英美的民主政治与苏联的民主政治相比较，寻找它的不足，又把它与德意日的独裁统治相对比，探寻它的进步性，这显然已经跳出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带有很强的辩证理性色彩。

(2)资产阶级民主有真实的一面。如前所述，邹韬奋曾把资产阶级民主称为虚假的、欺骗民众的鬼把戏。抗战时期，邹韬奋对这一认识有所修正，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真实的一面。

邹韬奋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一般性，就是“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因素或条件”。“如果失去了这一般性，便不是民主，或徒具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108]所谓民主的特殊性，就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各国民主各有其特点”^[109]。从世界范围看，不仅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别于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且“在欧美各民主国，彼此之间各有其特点”^[110]。

民主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由“人民”和“治理”两个希腊字组合而成，意为“人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来治理”。邹韬奋指出：“民主政制的意义，最扼要而为政治学权威所一致接受的是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实际上合于这个原则的是民主，在实际上不合于这个原则的便不是民主。”^[111]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具体化到政治实践中，可以得到现代民主政治的三个一般性条件：“第一，必须有真正的民意机关；第二，必须有真能对这样的民意机关切实负责的政府；第三，必须切实保障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并得通过民意机关监督其切实保障之必须实现。”^[112]拿这一标准来衡量英美，他认为英美是“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113]，是“先进的民主国家”^[114]。

从第一点看，“国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机构”^[115]，有无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国会是衡量一个国家有无民主的重要标准。西方国家的国会在封建时代是“咨询机关”，其成员也是由“统治者为人民指派”，但经过资产阶级和人民的长期斗争，国会不仅实现了民选，而且国会的权力也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民意机关”^[116]。国会代表的选举也从“最初限制极严”渐渐地走向“平民化普遍化”^[117]。普遍、平等、直接、无差别的无记名投票，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

从第二点看，西方国家的议会不仅有“立法之权”，而且还有“监督之权”“弹劾之权”。“英法的内阁，国会不信任就须改组，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英法美这些国家的国会“对于高级官吏有持续不断的监督之权，必要时有弹劾之权”^[118]。正是因为欧美民主国家的国会拥有监督和弹劾之权，所以议会开会时，往往出现质询不断、争执不休，令政府官员无法下台的“紧张情形”^[119]。

从第三点看，“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20]欧美民主国家，无论是英法美还是其他哪一个，“翻开他们的根本大法——宪法——可以看到对于人民

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有规定”^[121],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定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有着较好的落实。在欧美民主国家,人民可以自由批评“政治的得失”^[122]。有了这一自由,“在积极方面可以反映人民的要求,在消极方面可以发生继续监督政府督促人民代表的作用。”^[123]在西方民主国家,“民间舆论的力量和民众所表示的倾向”^[124],是政府当局决定政策的时候不得不加以慎重考虑的重要因素。国会内“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各党有各党的目标,往往互相非难”^[125],但一般不会有“因为人民中有在野党籍或被疑与任何在野党有关系而打破他的饭碗”^[126],更不会出现某个公民因为公开批评政府的某项政策或法令而遭拘捕、监禁,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之类的事情发生。

把民主的一般原则具体化,再细致地考察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简单地说“不”,这是邹韬奋民主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他在这一阶段能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辩证否定,提出比较客观公允的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3)资本主义民主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一般说来,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大宪章’产生于一二一五年;当时由‘叛变的’贵族提出一个长表,其中包含种种特许的权力,强迫国王约翰签字承认,即形成了著名于世的‘大宪章’。”大宪章“虽不能说有什么民主的倾向,但是已启示了以后人民争取宪政的途径。”^[127]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宣言”,规定“国王不得中止法律,不得干涉自由选举及国会议员之自由言论与行动”等等,民主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28]。此后,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天赋人权’和政府必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的观念更被普遍地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发展又达到一个较高阶段”^[129]。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由资产阶级为主导”,但“这种革命所争取的政治的自由不仅有益于资产阶级,也同样有利于无产阶级与农民”。欧美各民主国的宪法虽然“都是以保障私有财产为前提”,但也写入了一些保障大众自由权利的条款,大众可以“利用宪法上所仅与的一些自由,以争取本身的利益”^[130]。

邹韬奋肯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民主政治运动划一新时代”^[131]。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出现了与英美的“旧型的民主”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的民主”^[132]。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大众的民主”^[133],是真正为全体人民共享的民主政治。但他同时认为,十月革命以后,“新型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固然是扩展它的光明的前途”,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就从此走向了绝境,相反,在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挑战和刺激下,“旧型的民主(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由于各国人民继续努力,要求‘加深并扩大民主政治的领域’,也要逐渐变化它的内容,往更高的阶段前进。”^[134]一战以后欧美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实绩,即是最好的注脚。

(4)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正是民主精神的表现。邹韬奋认为,竞争与合作是民主的两种精神,“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有了几个政党,为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在一致对外的时候,应该精诚团结,努力合作,同时在有益于国家民

族的工作上，却不妨作公平的竞赛，各以优良的成绩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135]因此，他虽然高度赞扬苏联无产阶级专制的一党制，但也不否定资产阶级的多党竞争体制的民主意义：“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决定于人民的执行‘改选’，正是民主精神的表现，而且即使在朝党（是由于人民选举结果而上台的，这点最须注意）对于在野党也不能实行‘对付异党办法’，压迫异党的存在，而仍须博采舆论（在野党包括在内）。”^[136]“党派是为着它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奋斗的！”^[137]英美这些国家虽然是资产阶级国家，主要党派也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不同的党派联系的阶级或阶层还是有广狭之分的，不同党派的竞选纲领也有一个谁更有利于大众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的大选对民众而言也就不完全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资产阶级不同党派的执政虽然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但这不影响选举本身民主性的一面，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仍体现出“多数统治”（the rule of the majority）这一民主的原则和特点^[138]。

（5）中国应该积极地学习英美民主政治的优点。子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一个人，只有虚心地学习他人的长处，反省自己的不足，才能进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只有积极“吸收他国的优点，配合本国的需要，才能向着进步的大道上迈进。”^[139]从世界民主发展史看，当民主制度在中国发轫、建立之时，欧美“先进的民主国家”已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民主实践了，因此，“它们的实际经验，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也是极合理而又极寻常的事情”^[140]。中国要建设和完善自己的民主政治，就一定要积极“学习‘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民主政治方面值得我们仿效的优点”，并且“学习的精神愈充分，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愈受其福。”^[141]反之，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盲目自信，一切都是自家的好，把尚在摸索民主之路的中国当作民主的模范，“一切自由人的天堂”^[142]，把政府设立的一些开明专制的把戏，如抗战时期设置的“国民参政会”一类咨询机构，当作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充分表现’”^[143]，其结果必然是延误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让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遭受到莫大的灾殃”^[144]。

在这一阶段，邹韬奋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带有很明显的理性、辩证的色彩，这固然是他对民主问题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简单、偏颇到复杂、全面，思想趋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当时中国处于全面抗战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有关。

从国际上看，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先后控制了德意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对外穷兵黩武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独断独行，藉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给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是民族自卫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当时英美和苏联都是中国的与国，都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构筑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切，客观上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那些熟悉列宁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民主负面评价的左翼知识分子重新认知资本主义民主的

价值和意义。

从国内来看,抗战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斗,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民主,广泛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加抗战。此时在中国领导全国抗战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的特点是“集权过度、专制有余、民主不足”。中国的抗战大业迫切需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145],但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时期,中国不可能抛开国民党,另造政治中心,更不可能抛开国民党这股抗战的重要力量。因此,邹韬奋在1941年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中国不适用苏联的一党政治,也不适用德意式的一党专政”^[146]。抗战时期最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就是“各党派同时并存与团结合作的民主政治”^[147]。这种民主政治不是“一”,而是“多”,“是出于多党的方式,而不是任何一党专政的方式”^[148]。那么这种民主政治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政治呢?考察邹韬奋的全部言论,可以发现,他仅有一次说过“其为多党制,与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专政的民主显然也不是相同的”^[149],他反复强调的是这种民主政治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一党民主制。在除了苏联尚无更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情况下,这种多党团结合作的“真正全民民主政治”^[150]显然主要应借鉴英美等西方国家民主建设的经验。

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欣赏到否定,从将其看作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并竭力崇拜到贬斥其是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民主;第二次转变是从全盘否定到辩证否定,在坚持欧美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这一看法的同时,他承认“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是民主精神的表现”,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不少真实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民主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在不停地发展与进步,有值得中国认真学习的一面。邹韬奋的这些认识主要不是在书斋中读书、思索的结果,而是他“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努力奋斗的结晶。从历史的角度看,邹韬奋的肯定、否定、扬弃都是和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联系着的,是他“忧时从不后人”(周恩来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索中国政治的出路,谋求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历史见证,也是他民主思想不断突破、发展,走向成熟的表现。

注释:

[1][94][99][102][131][134][149][150]邹韬奋:《我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387、390、386、387、388、391、390页。

[2]耿云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郭俊英、孙毅主编:《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13页。

[3][4]邹韬奋:《经历》,《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159页。

[5]这里说邹韬奋在1919年以前是个民本主义者的主要依据是他在15岁以前主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教育,在南洋公学读的是工科,且“学校里所学的国文还是文言文,读的是古文”(《韬奋全

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渠道比较少。参阅杨宏雨、吕啸：《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6]邹韬奋：《今日的五四运动纪念》，《韬奋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3—394页。

[7]邹韬奋：《访问胡适之先生记》，《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6页。

[8]“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民权主义之研究”是上述四篇文章的副标题。

[9][11][14]邹韬奋：《那一位住进去？》，《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283、283页。

[10][16]邹韬奋：《美国国家的两个得宠儿子》，《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1、350—351页。

[12]邹韬奋：《胡佛的政敌史密斯》，《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13][15][17]邹韬奋：《贩报童子出身的胡佛当选了》，《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6—397、397、396页。

[18]邹韬奋：《英国工党内阁的试金石》，《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3页。

[19]邹韬奋：《分工合作》，《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8页。

[20]邹韬奋：《平民总统的平民交际忙》，《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

[21]邹韬奋：《美法总统的薪俸》，《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22]邹韬奋：《美总统儿子开始工作》，《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7页。

[23]邹韬奋：《老子是另一回事》，《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9页。

[24][32]邹韬奋：《美总统的儿子》，《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309页。

[25]邹韬奋：《终身事业》，《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26]邹韬奋：《那样富也无可如何》，《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644页。

[27]邹韬奋：《英国总选举中的家事》，《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28]邹韬奋：《女权膨胀》，《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6页。

[29]邹韬奋：《英国内阁的女部长》，《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705页。

[30]邹韬奋：《夫妇同做国会议员》，《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31]邹韬奋：《到棺材先生家里做客》，《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5页。

[33]邹韬奋：《剩余的孩子》，《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2页。

[34]邹韬奋：《我们的立场》，《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6—257页。

[35]邹韬奋：《今后全国应集注的三大工作（下）》，《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今后全国应集注的三大工作》包括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发表在《生活》周刊第6卷第30、31、32期，时间分别是1931年7月18日、25日和8月1日。

[36]邹韬奋：《研究与盲从》，《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5页。

[37]邹韬奋：《萍踪寄语（初集）·弁言》，《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

[38]邹韬奋：《不平等条约到底说些什么？》，《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222页。

[39]据笔者不完全检索，邹韬奋1929年的文章仅在《虽败犹荣》一文中出现过“帝国主义”一词。

[40]邹韬奋：《教育革命的应声》，《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41]邹韬奋：《梁胡讨论的讨论》，《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224页。

[42]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文集》（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54—355页。

[43]邹韬奋：《我们最近的趋向》，《韬奋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44]邹韬奋：《一致的严厉监督》，《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45]邹韬奋：《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

447 页。

[46] 邹韬奋:《除自救外无办法》,《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4 页。

[47][48]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韬奋全集》第 10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27、828 页。

[49] 邹嘉骊编著:《邹韬奋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73 页。

[50] 邹韬奋:《瑕瑜互见的法国》,《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93 页。

[51] 邹韬奋:《巴黎的特征》,《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88 页。

[52][53][54][64] 邹韬奋:《再到巴黎》,《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93、793、794、794 页。

[55][56][57] 邹韬奋:《华美窗帷的后面》,《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18、718、720 页。

[58][59] 邹韬奋:《大规模的贫民窟》,《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64、765 页。

[60][61][62] 邹韬奋:《独立观念中的叫化子》,《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67—768、767、766 页。

[63][65] 邹韬奋:《“巴立门的母亲”》,《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54—755、755 页。

[66][67][68][69][70][71][72] 邹韬奋:《纸上自由》,《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60、761、760、763、760—761、763、760 页。

[73] 邹韬奋:《萍踪忆语·弁言》,《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94 页。

[74][76] 邹韬奋:《从伦敦到纽约》,《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05、308 页。

[75] 邹韬奋:《物质文明与大众享用》,《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09 页。

[77][78][79][80] 邹韬奋:《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32、332、331、332 页。

[81][83] 邹韬奋:《由柏明汉到塞尔马》,《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66、465 页。

[82] 邹韬奋:《南游》,《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55 页。

[84] 邹韬奋:《黑色问题》,《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48 页。

[85][86] 邹韬奋:《赶快》,《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59、360 页。

[87][88] 邹韬奋:《掌握全美国经济生命的华尔街》,《韬奋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22、317—318 页。

[89] 邹韬奋:《人的问题还是政体问题》,《韬奋全集》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03 页。

[90] 邹韬奋:《萍踪寄语(三集)·弁言》,《韬奋全集》第 6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 页。

[91] 陈晓兰:《“两个苏联”——20 世纪 30 年代旅苏游记中的苏联》,《性别·城市·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10 页。

[92][93] 邹韬奋:《关于苏联的一般的概念》,《韬奋全集》第 6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7、279—280 页。

[95][115][118][127][128][129][135][138] 邹韬奋:《宪政与民主》,《韬奋全集》第 9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65、267、268、263、264、265、270、271 页。

[96][101][104][107][132][133] 邹韬奋:《苏联的民主》,《韬奋全集》第 9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2、112、107、112、112、107 页。

[97] 邹韬奋:《欧局的惊人变化》,《韬奋全集》第 9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页。

[98][105] 邹韬奋:《〈关于宪政与文学的几个问题〉编者按》,《韬奋全集》第 10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6、36 页。

[100][108][109][110][116][136] 邹韬奋:《中国民主的一般性》,《韬奋全集》第 10 卷,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5年,第750、746、746、746、748—749、749页。

[103]陈独秀:《给西流的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3页。

[106]邹韬奋:《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7页。

[111][148]邹韬奋:《民主阵线中的苏联》,《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704页。

[112]邹韬奋:《中国民主的特殊性》,《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8页。

[113][124]邹韬奋:《国际反侵略运动》,《韬奋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386页。

[114][139][140][141][142][144]邹韬奋:《政治上的学习精神》,《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4、795、794—795、799、795、799页。

[117]邹韬奋:《民意机关的组织与职权》,《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1页。

[119]邹韬奋:《民意机关与政治的推进》,《韬奋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120]列宁:《两次会战之间》,《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121][123]邹韬奋:《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6、707页。

[122]邹韬奋:《实行宪政与文盲》,《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9页。

[125]邹韬奋:《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韬奋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126]邹韬奋:《一个综合的研究》,《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281页。

[130]邹韬奋:《〈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本质问题〉编者附言》,《韬奋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6页。

[137][147]邹韬奋:《党派与人权》,《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90页。

[143]邹韬奋:《中国是否民主国家》,《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145]邹韬奋:《再谈抗日各党派对宪政的要求》,《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146]邹韬奋:《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9页。类似的表述在《〈关于宪政与文学的几个问题〉编者按》《党派与人权》《我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民主阵线中的苏联》《中国民主的特殊性》等文中都有。

[责任编辑:陶婷婷]